



# 从乡野到屏幕:乡村社会时间景观变迁的人类学研究

姬广绪

**[摘要]** 随着媒介化社会的飞速发展,以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现代媒介高度嵌入乡村日常生活,并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对江西省Z村的民族志研究发现,村民与短视频平台的商业生产形成了一种内外双向、纵横交织的“共演”模式。传统乡村社会时间景观的变迁不可阻挡,但村民仍旧可以依托地方文化基础,在理解数字媒介的同时,理性地调适现代时间观念与传统时间惯性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日常生活实践与商业触角相制衡,将生态时间与媒介时间拼贴在一起,形成新的权力—需要关系,在新技术媒介激起的时代涟漪中形成自身独特的媒介实践。在这种不断生成转化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村民的闲暇时间被用于短视频平台的商业化生产,另一方面,短视频也成为嵌入村民地方农事节律中的休闲点缀。这种非对立、非二元的现代乡村时间景观模式恰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拼贴和嵌套,是乡民日常生活的新形态。

**[关键词]** 短视频平台;乡村;商业性时间;媒介化

媒介化社会的发展势不可挡,无论是在都市社会还是乡村,它不仅带来了强有力的“链接效应”,让世界信息共享,也产生了深刻的转化性,让媒介生成的世界变成了世界本身。在今天广大的乡村地区,短视频平台的下沉让村民开始与平台互联,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将一个全新的媒介世界与乡民连接。媒介正在通过深刻的“转化性”生成一个新的线上线下关联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乡民原有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开始被重置和转化。村民以往的闲暇时间开始被数字媒介占用,他们主动利用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开始了一种新的文化实践——基于观看和浏览行为的“数字闲暇”。以往被认为是非生产性、几乎没有价值甚至需要被“消磨打发”的时间,被媒体转化成为一种有意识且主动的基于注意力和流量变现等商业逻辑的商业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互联网时代欠发达地区乡村‘在线都市化’研究”(21BSH04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数字乡村发展路径研究”(2021RC233)。

**[作者简介]** 姬广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广州城市舆情治理与国际形象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致谢]**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李映学做了大量田野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工作,在此致谢。

性时间。电子信息技术打破了乡村原有的时间共识和实践模式,新的媒介实践不断影响和重新组织民众对地方社会时间感的集体认知。乡村社会被“商业时间”裹挟,媒介逐渐将以往基于生计方式的“生态时间”转化为基于短视频平台逻辑的“商业时间”,而这也成为乡民新的时间观念转化生成的动因。由数字技术引起的“线上线下一时间挤压和争夺更为直接和激烈,乡民的时间节律开始被媒介塑造,进而生活方式也被改变,数字技术本身也因为关联着“个体—社会时间—集体”等多个维度而呈现较高的复杂性。

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江西省Z村中老年村民的时间感知和实践为例,通过深度参与的田野观察,深描中老年村民日常劳作和媒介实践的真实图景,探究村民围绕生计转型和媒介消费所展演的时间感知和生活实践,进而从理论上阐释媒介作用下“个体时间”“生态时间”和“媒介时间”三者之间关系的嬗变以及“商业时间”的出现对乡民的文化意义,探究媒介化时代时间节奏的变化及其理论与现实意义。

## 一、文献回顾

时间是一个跨学科讨论的亘古话题,不同的年代、学科视角、社会背景的研究对“时间”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人类学把时间分为“物理时间”“文化时间”“神圣时间”等,时间在人类学眼中更多的在于它的文化建构特质。涂尔干在《原始分类》一书中认为,时间不只是所有社会活动不可缺少的要素,并且是构成文化的知识系统的基本分类概念之一(涂尔干,莫斯,2012:76)。埃文思-普里查德(2002:114)受到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他在研究努尔人社会时把时间划分为“生态时间”与“结构时间”,时间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结构所界定。因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社会结构,也有不同的时间节奏。在中国语境的经验研究方面,王加华(2015:14)透过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的研究,讨论了乡土社会“被结构的时间”的话题。郑作彧(2018:4)提出将时间视作从社会当中形成的产物,认为时间是一种本质上具有社会性质的、可视作社会事实的社会产物。湛晓白(2013:299)则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较为完整地勾勒了近代时间制度和时间观念变迁的整体面貌。

传播学从人类媒介发展史角度把媒介作为影响人类共同体的外部性技术,将时间理解为媒介与人类社会互动的结果,把其分为自然时间、钟表时间和媒介时间。在技术和社会共同建构下,农业社会培养“自然时间”、工业社会培养“钟表时间”、信息社会产生“媒介时间”(卞冬磊,张稀颖,2006)。在传统的乡村,时间就是一种典型的自然时间,村民并不需要严格遵守钟表时间来安排生活劳动。钟表时间更像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时间,钟表固定的时刻表是线性的、一元化的,讲求准时和高效,人们的生活节奏被有秩序地安排着,时间提醒自己不能偏离生活轨道(李蓉,2008)。21世纪初,“媒介时间”概念被提出,张文娟(2022)认为智媒技术使用户不必被媒介内容

挟持于特定时空中,根据个人意志实现日常生活场景的“即刻嵌入”。人们随时随地沉浸在数字内容中,对媒介时间的感知变得麻木。智媒时间从线状云转变成微粒化、无序化、个性化的“点状云”特征。卞冬磊(2022)认为手机是“具身媒体”,遍布生活的全部场景,轻易地就打开了日常生活的缺口,短视频也是缺乏逻辑性的,线性的段落式时间被不断切割,被改造为零散、无序的原子化时间。

通过梳理文献可知,学界对时间的认识逐渐演变,经历了从“自然时间”到“媒介时间”的过程。目前学界对“媒介时间”的研究主要在于新媒介的出现对时间的切割和重组,以及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媒介时间对于劳动的控制问题。这非常深刻地揭示出时间在商品经济中的重要价值,也给讨论当下社会的时间观嬗变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础。然而,将以手机和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智能媒介嵌入乡土社会,具体而微地透过审视乡民的日常生活以及相关的媒介实践理解现代的时间性如何与乡土已有的自然时间碰撞、互动进而重新形塑人的时间认知,此类研究目前还相对较少。基于上述认识和田野观察,本文将深入探讨以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为代表的现代媒介在乡村日常生活的高度嵌入及其带来的深刻影响,基于“共演”模式理解短视频平台嵌入乡土社会的商业逻辑以及乡民依照乡土逻辑的能动实践。

## 二、从农时到闲时：乡村时间结构的媒介性转变

时间和空间构成了理解中国乡村的两个核心维度,也是乡村转型的结构性内涵。传统乡村日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关联构成了乡民的文化,由此规约着人们的实践惯习。例如,农事的安排就是基于时间和空间一致性在特定地域社会的周而复始的文化和社会实践。这种关联是稳定的,连续和统一的,约束着共同体中成员的集体行为。然而,现代性打破了传统的时空一致性,时空的分离和重组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系统的“脱嵌”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现象,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吉登斯认为“时空分离”是在技术供给条件下个体跨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时空开始空洞化,并逐渐与具体的地点、事件相分离,逐步取得高度的标准化和精确化的过程(杨善华,1999:240)。吉登斯的理论建树深刻地反映了当下中国乡村的媒介图景。2023年,课题组深入江西省Z村开展田野调查,整个调查过程中看到今日中国城乡居民日渐趋同的媒介消费图景。村中无论老少,无关性别,手机已然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电子伴侣。田间地头、村头巷尾,我们总能看到人们对着手机,手指上下翻飞,目不转睛,旁若无人地盯着屏幕,周遭的环境仿佛与他无关,他们抽身于现实空间,沉浸在网络空间。

Z村位于鄱阳湖平原地带,三面环山,背靠农田,仅有一条小路可到达镇上,距离为4千米左右。该村村民共有310余人,皆为汉族,村民使用本地方言,仅在外上学的孩童会说普通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村中的青壮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部分

子女也同父母随迁到务工地读书。与中国大部分乡村一样,目前 Z 村日常居住人口不多,以中老年人和留守家中的青少年为主。在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后,乡村原本基于人—空间—时间的传统结构被消解,大量人口外迁和房屋空置让原本作为交往空间的邻里消失了。笔者于 2023 年 1 月至 3 月在 Z 村及其周边开展了第一次田野调查,当时适逢春节,在外务工的村民纷纷返乡过年,村庄热闹异常,行走于村中时常能看到村民一家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打牌或者闲聊家常。2023 年 6 月,笔者在 Z 村进行第二次田野调查,其间走遍了村庄的广场、小路、田野,几乎见不到人影。大部分村民的家门紧闭着,只有贴近门窗时,才能听到屋里传来手机中短视频的声音。笔者与村民渐渐熟悉后从村民口中得知,“如今乡村农活不多了,闲暇时间比较多,村里好多人喜欢上了刷抖音”。

### (一) 以乡土集体活动为核心的地方性时间结构

费孝通将中国乡村的本质定义为“乡土性”,“乡土”的核心是土地(束缚),是乡民与土地之间的互动和联系。此种互动和关联是群体性的,是一种基于共同文化认同的“共同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乡土社会理解为通过乡村共同体以农事劳作的协作和农事节律的规律性为前提的统一的时间安排为核心内容,并围绕此种时间安排形成的地域共同体。乡土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是动态的过程,是乡民时间感知和时间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如果要考察乡土社会的时间观的流变,就要先回归到乡土社会传统时间观,以此为逻辑的起点。

传统的乡村生活围绕自然经济展开,生活中的活动安排和时间观念也自然依附农业耕作而展开,形成一套稳定、可沿袭的时间结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态时间观深入人心,并与地方文化有机融合,宰制村民的日常生活(许然美,杨成胜,2008)。而这样的生活图景也构成了人们对简单、淳朴的乡村的回忆和期许。在前现代的乡村,民众生活的流动性很小,他们安土重迁地稳定在社区之内,全家老小年复一年地与土地“内卷”在一起,农业生计方式、稳定的民间交往方式、宗族化的自治体系界定了同步的“生活节奏”以及由此刻印在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感知,而这种时间感知和生活节奏也反过来强化了时间的地方性。

一是地方化时间表征的重复。在 Z 村每逢大年初一,村民们都会固定自发地集体上山拜神。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时间段,春节期间的拜神活动是该村沿袭时间最久、参与人数最多的文化活动。大年初一的拜神,也被村民称为“出方”,是在村后高山上的殿子岭神庙进行的酬神活动,神庙中供奉着“圣母娘娘”。前去拜神的村民会把祭祀供品从家中端到神像前,祭祀物品通常为一个烹制好的猪头——村民称之为“乘福”,一条鱼,还有一些豆腐、肉类、白酒,“乘福”上用一根筷子正中插着,朝向神像。关于祭神的时间,村长都会提前在微信群提醒,因为按照原本村中长辈规矩,天亮拜神“出方”,然而部分村民相信大年初一的头炷香会带来好运,因此大年三十晚上,很多村民几乎不睡觉,晚上 11 点半左右便相互邀约去殿子岭神庙,希望赶在大年



初一的零点零分点上自己的香烛。年复一年地赶在凌晨祭神成了Z村村民的文化记忆,地方化的时间节奏和重复形塑了一套沿袭至今的生活习惯。

二是村落文化利用时间作为文化符号强化族群认同。在Z村,时间附着在族源迁徙传说、族谱、祭祀中,在村落传承性的历史叙事与实践过程中转化成为文化符号,被用来强调族群之间的差异,强化族群内部的认同。Z村是一个以李姓为主的村落,村中九成以上的村民都姓李。根据族谱记载,他们的先祖最早是从甘肃迁到本地的,直到现在村中的李姓祠堂仍悬挂“陇西世家”的匾额。据村中的老人回忆,该村原本姓杨,但是当时村中人口稀少,缺少男丁,便从邻近乡镇“李家洲”村找了一位男人来,这个男人也就是后来该村李姓的祖先。族群认同的文化符号自此开始发生改变。外来的李姓男人成婚后,生了几个孩子都没有姓杨,而是姓李,杨姓老人渐渐地去世后,村庄只剩下了姓李的。慢慢地,历史被淡忘了,以往为纪念杨姓祖先的厚德,村民每年祭祀都需要先拜杨氏恩人,逐渐地也将李氏祖先放在杨氏祖先中一起拜。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李姓逐渐成为Z村村民的集体认同。类似的族源传说在全国各地的田野调查中屡听不鲜,往往这类故事都有着鲜明的族群认同预设和叙事框架,通过上文的描述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不同姓氏之间彼此有别、泾渭分明,族群内部通过同步的时间制度和活动安排完成族群边界的廓清,并在重复性中维持此种边界的存在。

在此过程中,时间成为被文化利用的重要符号来标榜自身独特性,从而与其他邻近族群区别开。与本地区的其他村落不同,Z村的村民将每年的腊月二十七作为最重要的“还年福”的日子,也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而周边临近村落中的曹姓则在腊月二十八“还年福”、高姓在腊月二十九,不一而足。就像马尔库塞(1989:81)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说道,“这些自明的分析性命题似乎有着巫术仪式规程似的作用。由于不断被强行嵌入接收者的大脑,它们产生了把意义封闭在规则所给出的条件范围内的效果”。正是基于这种不断重复的族群起源的信息共享,以及在此种文化阐释基础上的一系列时间区隔实践,时间结构成为Z村社区性生产的重要符号。

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理解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转型是讨论现代性的一个关键问题,尤其是时间,因为时间不仅是变化的必要方面,而且是稳定性的必要方面,除此之外,时间还是秩序的核心(亚当,2009:177)。在传统社会,时间和空间在地方是高度关联的两个维度,每个社会、每个族群都会有各自独特的时间制度和生活节奏,如果不以地方和其他社会标记为参照,时间就无法被理解(李翠玲,2017)。而现代电子媒介的出现打破了吉登斯提到的“时空对称”,村落中的个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步生活成为常态,空间不再成为时间感知、安排和实践的依据,媒介化的时间安排开始不再受农业生产和自然节律的影响。

## (二) 电子媒介形塑下乡村时间景观的去地方性

乡村情境时间的去地方性主要指在乡村空间中村民的时间安排和实践已经逐渐

不再完全围绕农事生产的自然时间周期而展开,失去了上文中提到的社区性和地方性,以往围绕地方性知识和经验建立起来的时间认知难以为新的时间感知和实践提供有力的解释和辅助。乡村时间景观的转变与乡村结构化变迁有着很重要的关联,如今的中国乡村既有费孝通(2008:32)在《乡土中国》里所描述的“乡下人离不开泥土”的一面,也有《最后一公里乡村》描绘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和儿童留守乡村的空心化问题,还有现代技术涌入乡村后带给村民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

1958年左右,Z村和江西很多地方的乡村都安装了有线广播,主要是出于国家对基层乡村的政治宣传以及社会教育的原因,这也开启了乡村时间标准化的进程。据村民回忆,每天早上六点半,村里的大喇叭都会准时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当《歌唱祖国》响起,村民们就意识到新的一天开始了。广播成为村民了解外部世界、拉近和国家之间距离的一个重要渠道。从此,广播这一现代媒介在国家统一力量的作用下逐渐融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构建出了一套突破地方的时间性,形成了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强关联。

改革开放以后,广播这种媒介的作用力开始式微,这种作为一个时代标志的基层乡村媒介被更加市场化的媒介替代,例如代表现代性的电视机、VCD、DVD等时髦媒介。因为Z村自然条件一般,农业对乡民生活的支撑有限,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的村民开始纷纷外出务工。据Z村村主任<sup>①</sup>讲述,村民们外出打工主要聚集在广东、浙江一带,从事建筑行业 and 服装行业等。外出务工的经历不仅仅是收入的提高,更加重要的是村民在经历了进城的生活后,将城市的生活方式带回村里,电视机、VCD开始走进村民的生活。这些现代媒介不仅开阔了村民的眼界,也让村民的时间观被卷入到全球体系中,乡民的时间观变得与外界更加统一、共振。

### 1. 时空异步:闲暇与乡村时间观的变迁

上述的市场化、全球化深刻影响了Z村村民的时间意识,通过现代媒介营造的链接性和流动性,村民超地域性的时间感知和时间安排成为日常,而新的时间感知和时间安排会反过来作用于地方,进而改变当地的生产实践。Z村村民外出务工这种超地域性的文化和生活体验在乡村的传播,不仅让现代化、标准化的时间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带来了一种时空异步的现代性图景。众所周知,外出务工的人多为成年劳动力,尤其是处于中壮年的男性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从农业中抽离会改变原有乡村农业生计模式中的劳动力配比,进而影响农业劳作的时间分配和效率。Z村和中国广大空心村一样,面临土地闲置和集中流转问题。从2015年起,村里出现了土地承包制度,外村人批量承包村中较为集中的土地,实现机械化耕种。很多家庭选择将自家的承包地转包给村中的农业专业户,每年收取每亩250元的承包费,自家只留部分承包地以供日常口粮

<sup>①</sup> 访谈对象:村主任,48岁,男,小学肄业,平日和妻子一起生活,其女儿在读大学,其儿子在县城读高中。

即可。将土地出租出去的村民如有余力,可以去种植一些棉花、花生、油菜等经济作物,或者在家帮镇上的工厂做手工产品,以获得一定收入(见表 1)。

表 1 Z 村乡民年度劳作时间安排

| 农历月份 | 农事活动                              | 农历月份 | 农事活动                   |
|------|-----------------------------------|------|------------------------|
| 1 月  | 春节走亲访友,无农事活动,元宵节后<br>大多数村民陆续外出打工。 | 7 月  | 原为收割早稻,种植晚稻,俗称“双抢”,现无。 |
| 2 月  | 准备养猪的饲料、种蔬菜。                      | 8 月  | 原为收割早稻,种植晚稻,俗称“双抢”,现无。 |
| 3 月  | 种植棉花等农作物,雨季时常赋闲在家。                | 9 月  | 原为收割晚稻,现主要种植油菜、萝卜等。    |
| 4 月  | 收割油菜,雨季时常赋闲在家。                    | 10 月 | 上山砍柴,种植红薯。             |
| 5 月  | 部分村民种植水稻,栽种芝麻。                    | 11 月 | 上山砍柴,无其他农事活动。          |
| 6 月  | 锄草,灌溉。                            | 12 月 | 无农事活动,在外村民返乡过年。        |

从表 1 可以看出,以往村民年度的时间是具有一定节律性的,在农历春季和秋季较为繁忙,而在夏季、冬季和下雨时节较为清闲,没有过多的农事活动。闲暇作为村民日常劳作中的重要调节机制,在以往的农业生产中是与农业劳作强度密切相关的。人们会根据劳作的季节和强度,有节奏地选择闲暇的形式和时间段。例如,在高劳动强度的劳作后往往会有一个较为重大并持续时间长的闲暇时间段,以此调节劳动强度,体现闲暇和劳作之间的依附关系。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趋于凋敝,村民有更多的时间享受闲暇,其闲暇体验不再和农业劳动强度相关联,而是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并产生一系列的时间异化(牛定炜等,2023)。

笔者在 Z 村参加了一场葬礼,根据当地习俗,来悼念的亲属需要为逝者守灵。现场,约有 30 人在灵堂附近坐着,有打牌的,有三三两两一起闲聊的,也有刷抖音的。到了晚上 10 点左右,村庄还有不少家庭亮着灯。一位打鼓的李爷爷感叹道:“以前这个时候,八九点就睡了,因为白天干农活比较累,晚上也没什么玩的,就早早睡了。现在习惯了晚睡,10 点钟还一点也不困,也或许是年纪大了没那么多的觉要睡。我老伴天天看抖音,现在 11 点都不想睡觉。”李爷爷的老伴冯奶奶<sup>①</sup>说:“我现在没种什么地,年纪大了,以前是睡得早,现在有了这个手机,新鲜事多,晚上睡不太着。”短视频平台进入乡村后,拖延了人们的生活时间,改变了村民以往熟悉的生活节奏,从“早睡早起”变为“习惯早起、难以早睡”,媒介使得村民的闲暇时间变得更加富足,而这些多余的时间最终都由媒介进行填补,闲暇的异化也由此产生。

## 2. 嵌入融合:媒介依赖与时间的无意义性

随着乡村现代性日益深化,乡村内生的媒介如庙会、节庆仪式等都开始失去以往的活力,现代媒介如电视、手机和互联网作为外生力量经过几十年的渗透过程,已经和现有的乡村形成了一套新的嵌入式格局。现代媒介为 Z 村的村民打开了一个新

<sup>①</sup> 访谈对象:冯奶奶,80 岁,女,小学肄业,平日和丈夫以及孙子一起居住。其孙子 28 岁,无劳动能力。

的生活维度,其作为一种拉图尔意义上的“行动者”与村民一道构成了基于媒介生存的行动者网络,媒介化生活成了村民的实践日常。

Z村同中国多数的乡村一样,经历了媒介的压缩式发展。据村民回忆,20世纪50年代末村里开始通电,电力对于农业经济和村民生活来说意义重大。2000年以后村中陆续有村民家安装了固定电话,远距离长途通话成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无论是电力还是电话机在初入Z村家庭生活时,村民对新的生活方式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文化震惊。然而,Z村的家庭成员几乎都没有经历过电脑时代就跨越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村中多数人家中直到现在都是没有电脑的。在村民的媒介素养和媒介可供性之间发生异位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过度的媒介依赖。

在手机作为一种易获得的媒介工具进入Z村前,村民们的闲暇安排是有规律和节制的。村中有六个大大小小的池塘,外部还有一条河港,这是村民农闲时垂钓的好去处,每年入夏之后就会有村民垂钓。另外,Z村靠山,山林时常有野猪、老虎出没,以往村民还会去山林打猎,2020年村委会出了通知,告诫村民保护野生动物,山林周边还安装了防护网,打猎活动被禁止了。对于村民而言,利用手机度过闲暇时光成为一种最经济也最安全的方式。当村民随时随地可以便捷地沉浸在数字内容中时,对媒介时间的感知会变得麻木(张文娟,2022)。梅花<sup>①</sup>和老公两个人在村中生活,平日靠给镇上的制衣厂加工服装计件获取收入,她说自己从小晕车,所以一辈子没有坐过汽车,也没离开过村子。她和丈夫还耕种了一些田地,栽种芝麻、蔬菜等。梅花说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觉得每天踩缝纫机又累时间过得又慢,一天下来觉得很疲劳。现在有了抖音,每天边踩缝纫机边看抖音,不知不觉时间就过了,也不会像以前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媒介在Z村的村民生活中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存在越发成为须臾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媒介不仅从功能上发挥作用助益便利人们的生活,更作为一种中介物影响和主导成为目的本身。村民们都表示他们对手机及其所具备的闲暇功能产生了依赖。现代媒介不断地以其自身多维度的可供性嵌入到地方社会的生活逻辑中,并生成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而这样的结构性后果就是时间不再成为村民感知地方、与地方互动的文化维度,反而越发被抽空社会意义,变成一种需要被消磨的无意义存在。

### 3. 脱域:乡村生活中的媒介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Z村的媒介实践同中国大部分乡村一样,经历了由国家主导的媒介基础设施的深度介入,形成了一套超越乡土的媒介景观,也客观上开启了地方脱域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媒介实践作为国家管理乡村的制度安排,村民的媒介参与行为被视为对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对管理制度的遵守,“国家时间”成为乡民的积极想象并

<sup>①</sup> 访谈对象:梅花,姓名已作匿名化处理,50岁,女,小学肄业,日常和丈夫居住。其丈夫原为木工,腰部受伤,不能外出打工。



深刻影响着乡村生活的面向(关琮严,2021)。从广播到电视,国家主导的媒介进入了Z村的每一个家庭,国家主导的媒介图景开始在乡村展开,乡民的时间观念开始与国家同步,并不断被统一化、标准化。20世纪80年代,外出务工乡民开始出现,这部分人对城市生活有了更多的认知,同时消费作为都市文化体验的最直接的方式,乡村都市化进程便在Z村同步出现。这种既属城又属乡的生活体验赋予了乡民个体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以及更加强烈的主体意识。正是这种主体意识让村民开始围绕个体组织时间实践,通过赋能个体实践的现代媒介技术展现更加“脱域”的时间体验。手机在今天的乡村主导了一种脱域的“媒介时间”,这是基于个体媒介时间的时间安排,重置了乡村原有的基于共同体实践的时间规制。在以往基于乡民文化认同的时间惯性中,集体参与的公共生活(如丧葬、嫁娶、拜神等仪式)普遍需要一大家族的村民共同参与,这是一种稳定的共同经验基础上的传统的时间实践。手机的普及带来了时间的个体化趋势,村民娴熟并沉浸地与屏幕中的虚拟世界互动,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通过该媒介空间,以往的时间规制和惯习改变了,时间的“脱域”让这些永久在线的村民开始了一种永久社交的媒介实践。这既是打破时空地域限制向外连接的新型传播形式,也是外在的媒介时间内化的过程。

王加华(2015:73)在研究江南地区乡民如何度过闲暇时间时,提到除了走亲访友、泡茶馆、逛庙会、赌博,还有一项最容易被研究者忽视且占用乡民时间最多的娱乐活动,即闲聊。闲聊可以在家人、朋友、邻里间频繁发生。在如今的Z村,尽管由于耕种土地任务的减少,闲暇时间增加了,但闲聊大幅度减少了。平日的村内公共信息会通过微信群发布,如通知村民缴纳医保、传达县政府移风易俗会议通知、提醒村民不要焚烧秸秆等。村民中最流行刷快手和抖音,原因是使用界面对中老年人很友好,短视频内容丰富且有吸引力,同时根据村民的观看偏好,算法可以投其所好地推荐更受欢迎的短视频内容。刷手机成了村民们闲暇时间最主要的娱乐活动。本就因人口外流而冷清的村子,因为村民都闭户不出显得格外萧条。笔者观察发现,村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家,到了晚上还会有串门闲聊的情景,如李平家到了晚上8点左右就会有几位老人带着蒲扇坐在一起闲聊、乘凉,讨论农作物情况、村里村外的八卦以及网上看到的新鲜事,其他村民便已经不再串门走动。据村民自述,以前村里人多,能在田野或者村里路口见面,聊聊天。而现在村里人太少了,村民缺少玩伴和闲聊的对象。两家隔得远,就不愿意走动。再加上现在的房子隔音好,把大门关上,在不在家也不知道,所以宁愿在家闲坐看抖音,也懒得随便串门。

乡村时间结构的媒介性转变是一个整体性的嵌套过程,转变萌发于城乡差异与人口流动的时代底色,浮现于乡村时间景观中。最后成为村民消磨时间的日常生活实践,同时也在社会关系与组织方式上推动着乡村时空结构的现代化整体变迁。值得注意的是,在协助推动这一转变过程的背后,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短视频平台媒介主导下的媒介时间生产逻辑,还可以发现村民的主体性实践帮助挤开了传统自然时间

结构中的缝隙。这种客观上的“合作”关系似乎超越了通常意义上我们对于短视频平台、资本、农村与乡民的权力关系假设。

### 三、生态时间与媒介时间的拼贴：“共演过程”下的日常生活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乡民的年度生活时间可分为工作时间、生活必要时间、家务劳动时间、自由支配时间(王加华,2015:84)。由此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被划分为段落,分配给不同的活动。各种活动的时间虽然允许边界交错和调整,但总体上会形成特定的节奏,循环往复,构成一种惯例(西尔弗斯通,2004:122)。媒介的介入,则会改变人们的生活节奏,尤其是智能手机这类伴身性媒介,它时刻与人在一起,各种信息、交往和娱乐即时更新,吸引人们随时进入它所构造的场景中。由此,手机非常轻易地就打开了日常生活的缺口,线性的段落式时间被不断切割,成为零散的原子化时间(卞冬磊,2022)。而短视频等商业平台则运用这种时间缝隙,不断向用户推送简短、丰富、合胃口的短视频内容,诱使人们不停地、重复地观看,挤占人们更多的生活时间。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之所以在以Z村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社会迅速下沉,与其和乡土社会达成的“共演过程”(coevolutionary process)密不可分。

政治学家洪源远(2018:5)在其研究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提出了“共演”的理论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初期可能拥有看似脆弱或落后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并非完全阻碍发展,而是可以被利用来创造市场机会,推动经济的增长。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成熟,这些制度也会随之演化和强化,进而维护和支撑市场经济的运作。发展是一个动态的、互为因果的过程,不应简单地将善治和经济增长视为先后顺序的问题,而应看作相互依赖、共同演进的复杂体系。这个理论虽在政治学中关于中国解困实现脱贫问题的研究中有很大影响,但这个理论模型本身具备的解决“鸡生蛋、蛋生鸡”逻辑莫比乌斯环困境更具启发意义。关于现代性与乡土性在今天中国乡村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以往以二元逻辑为起点的研究多数将乡土性式微、现代性崛起作为理论起点。例如,功能主义视角的时间理论强调传统乡土社会的时间观念与农业社会结构相适应,强调自然节奏和社区共同体相协调,而现代时间观念则与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强调效率和生产力;社会冲突视角的理论认为现代时间观念的引入可能与社会阶级和权力结构的变化有关,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需求导致传统时间与现代时间存在冲突,乡民需要在压力和挑战下适应新的时间观念;更加“主流”的社会变迁视角的理论则认为随着经济、技术、文化的变化,乡民时间观念的变迁也要被纳入现代化的进程中来理解,时间观念的变迁是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反映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上述几个理论维度虽有助于理解乡土社会传统和现代的力量,却很明显地可以看到,“生态时间”和“现代时间”作为两种时间形态的分立和隔绝。当代社会学家乔治·古尔维奇提出了一个关于时间的社会等级理

论,认为不同的社会结构拥有各自独特的时间概念。古尔维奇(2010:29-32)将时间的微观社会形态细分为八种主要类型,按照他的区分,“生态时间”主要表现为“持久的时间”“迟滞的时间”以及“轮回的时间”。“持久的时间”指的是那些缓慢而持续的、似乎永无止境的时间感,“迟滞的时间”中时间似乎被延缓,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能展开,而“轮回的时间”指的是过去、未来和现在相互交织和投射。相应地,“现代时间”则是更多表现为“不规则时间”“欺骗性时间”,强调现代时间感掩盖了不可预见和突如其来的危机,以及不稳定和不规律的节奏变化。这两类时间观念依照“共演”理论是并行于乡土社会之中的,并同步作用于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个人行为。传统的观念塑造了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而产生了结构化的时间观念,而现代观念则通过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生产个体化的时间实践。Z村村民的时间意识充满了共演混杂性的特点,因为乡村社会既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使得他们的时间意识充满了停滞的和轮回的属性,然而因为短视频所生产的媒介时间感知又让他们同时体验到了不规则以及带有欺骗性的时间意识。这两种共存共演的时间意识不仅仅在村民们日复一日以及四季轮转的日常生活秩序中呈现出来,也在他们通过媒介和短视频平台消费的闲暇时间的体验中呈现出来,既传统又现代。

通过在田野中参与式地感受乡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一种基于“资源意涵”的时间观念变迁正在悄然发生。在村民的眼中,生态时间是有生产性的,可以产生价值,而闲暇的媒介时间则是不具备生产性的,无价值。这种观念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就得到了强化,并影响了现代社会的时间观念。面对社会快速变迁带来的结构性紧张和压力,时间的稀缺性大大提升,催生了人们对分配、掌握时间和发展时间管理技术的探讨。在工具理性和效率至上的驱动下,时间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语境下逐渐成为衡量和比较事物价值的标准,甚至凌驾于人的本体性之上,成为资本支配乃至奴役劳动者的重要手段(文军,陈蕾,2019)。在社会实践层面,时间的价值取决于它被利用的方式,一切不利于资本产出的活动如休息时间、闲暇时间都是应当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然而,随着生产模式的转变、数字技术在村落的普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时间意涵制度也在村落社会悄然发生着变化,二者之间的边界因为“算法经济”的出现被打破,时间意涵制度面临被消解和重构。因此,从理论意义上,时间意涵的复杂性需要重新被认识,并且需要被放置在中多维度的情境中去重新审视。对于Z村的村民来讲,闲暇时间原本是并不具备生产性的,然而当闲暇时间被短视频平台捕捉并转化成媒介消费的时间后,新的时间意涵就被生产出来了。平台化的媒介消费将以往乡民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化时间聚合成为一种新的“具有数据价值的媒介时间”,线性时间中以往因为碎片化而不具备价值的短时间被重组而“再时间化”。在实践层面,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通过与村落的社会网络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利用算法推出更加符合本地语言的内容、反映农村生活的视频,来吸引乡民使用。在启动阶段,短视频平台作为时间消费的催化剂,通过提供有吸引力的内容以及隐形的就业机会(例如村民自发的内容创作)强化用户黏性。随着农

村用户对短视频平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短视频平台就逐渐引入了更多的商业模式和市场规则,例如直播带货等电商模式,推动当地村民对短视频平台消费的认同、生活方式的转化,实现制度性的演化。短视频平台通过培育用户的使用习惯、创建使用场景,为村民闲暇消费的转化甚至异化提供动力和基础,并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实现闲暇消费的数字化和制度化。当这种基于共演的消费模式被固定下来,短视频平台基于数据收集和商品化的动机与村民的闲暇消费需求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需要关系并被制度化。

村民高阿姨<sup>①</sup>告诉笔者,“抖音又不收钱,它免费给我看,还有趣,我最多就是花费了时间,只要不从我口袋里拿钱,我觉得我也不亏”。村民产生这样的观念主要基于自己对时间和商业价值的观念理解不同。从时间方面来说,村民的闲暇时间是充足的,他们可以接受通过时间换取娱乐,并且村民在观看短视频中也不全是娱乐,他们可以通过抖音进行社交、了解外面的新鲜事,获得一种满足感。从商业价值来说,村民认为短视频平台可以通过不损害他们利益的方式进行盈利,“只要不从我口袋里拿钱”是村民的普遍认同标准。因为他们对于短视频平台的时间价值转换逻辑十分陌生。尽管短视频平台以及研究该领域的学者认为村民正在进行“免费劳动”,为短视频平台资本生产价值,但村民仍认为,劳动必须是实质性的才能创造价值,比如田间耕作、工地做工,而刷手机就是在玩。在访谈中,笔者尝试告知村民抖音平台的商业逻辑,高阿姨反复地表示自己的疑惑,“这些我不懂,反正就是好戏的(好玩的),平台要赚钱也是正常的”。

村中还有一位乡村主播花香<sup>②</sup>,她在家一边带孩子一边做直播维持生计,每月能有四千到一万的收入。对于乡村来说,她已经是高收入群体了。“你知道的,农村除了种地也没有别的工作,我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做主播,娱乐类型的,主要就是唱歌、聊天,粉丝也是来寻开心的。别人都以为主播很轻松,实际上短视频平台和公会管得很紧,系统要求每天必须直播2小时及以上,一个月至少20天。哪怕少一分钟都不行,如果不按这个要求做,每个月的钱就很少。公会还会制作一些数据榜,对主播的活跃度进行排名,排名越靠后,佣金越低。”短视频平台不断挤占主播的闲暇时间,要求主播投入直播当中,以便提升短视频平台活跃度。当笔者问到她如何看待主播与短视频平台的关系时,她解释道:“平台需要主播,主播也需要平台,尽管平台在抽取佣金,用各种办法催促我开播,但我觉得还是相互利用的,没有平台,我也赚不到这么多钱。”由此可见,不论是普通村民还是乡村主播,大多数人都以一种“共赢”的心态来看待自己和短视频平台的关系。

① 访谈对象:高阿姨,女,48岁,高中文化,平日和公婆、孩子在家,假期则带着孩子去深圳——其丈夫工作的地方。

② 访谈对象:花香,姓名已作匿名化处理,女,45岁,大专文化,平日在家照看小孩、做直播。



#### 四、结束语

本文以 Z 村村民的时间观念变迁和闲暇消费为切入点,讨论了短视频平台进入中国现代乡村社会之后带来的时间结构的转变,深描了当地村民面对新型媒介所展演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短视频平台以一种与当地文化和社会结构“共演”的形式改变了村落社会原有的时间结构,这种转变是一种内外双向的运动过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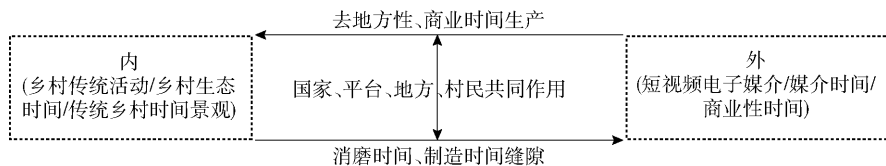


图 1 “共演”与“拼贴”

一方面,乡村的时间景观在现代媒介的冲击之下,被动地失去地方性。以往的乡村生活依靠传统的农业生计方式、稳定的民间交往方式和节日仪式文化活动等形成相对稳定的乡村时间结构,并以此来指导村民的日常生活节奏,带来一种相对规律、确定的地方时间感知。这种时间感知与实践的方式又反过来作为文化符号建立起村落的集体认同。但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建立,乡村生计方式被迫发生改变,耕地所得难以维持基本生计,外出务工人口增加,农村劳动力不足,土地大量闲置,乡村开始出现闲暇时间。传统乡村中以时间作为文化符号组织起来的乡土集体活动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在乡村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短视频之类的新媒介实践,成为村民们消磨时间、进行公共交往的主要选择。至此,乡村的时间景观在整体上发生了改变。

另一方面,村民自身对于乡村时间的理解与短视频平台公司的商业化行为共演,产生了时间缝隙,给短视频平台公司的商业性时间生产创造了机会。在前现代化时期,Z 村村民的闲暇与生产之间关系密切,闲暇是劳动过程中的重要调节机制。然而,现代化进程改变了村落社会原有的经济结构,农业经济的衰落以及人口外流带来了失衡的人地关系,留守的中老年村民被迫赋闲,因此大量的闲暇时间开始出现。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在下沉村落的过程中,利用其便利的技术可获得性以及短视频内容的易消费性迅速捕获赋闲村民的注意力,在填补村民赋闲时间的同时扩撑出更多的媒介时间。

与此同时,在这种双向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纵向时间维度与横向时间维度上国家、城乡、短视频平台公司、村民等不同力量的彼此复杂作用。在这里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国家力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村民生计方式的改变以及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既是个体想要改变自身生活的努力尝试,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国家发展战

略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化工业,建立现代化城市体系,带来了新的发现机会。而短视频平台公司能够进入乡村,不仅仅是因为短视频平台本身的内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也得益于国家近年来数字化战略的推进。另外,在经济下行的趋势之下,国家需要进一步释放农村潜在的需求,探索数字化时代的乡村振兴方式。尽管在文中所述的乡村时间景观的变化过程中,并没有十分明确而直接的国家角色出现,但是国家的力量始终藏在这种双向运动过程的背后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这种内外双向、纵横交织的媒介时间转变过程,最终形成的是一种不断流转变化的“共演”模式。实际上,这种模式不仅仅体现在乡村时间景观的变化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现代乡村社会的整体结构变迁。关于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学术讨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沉淀,有三种较为清晰的学术路向。第一类是把媒介的在地化和日常生活的关联用一种“数字化抗争”的话语进行表述,强调地方文化的规训力量,接纳新技术的同时对其进行在地化的改造和利用;第二类是把媒介化、数字化视为入侵、剥削,将技术的外部性视为一种负向社会效果,冲击日常生活既有的时空观和秩序节律;第三类则是本研究关注的融合视角,并不一味地强调抵抗或者剥削,而是基于实践视角,看到“共演过程下的日常生活”。在研究乡村社会的变迁时,我们提倡基于第三种模式本身的复杂变化过程讨论技术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关注这种模式中的某一个面向。例如在Z村,如果我们单单将村民的媒介实践当作一种被短视频平台公司算法控制的劳动,或者只看到村民们仍旧保留着一些传统的文化习性,并没有完全接纳商业的实践逻辑,就以此来得出一种确定的结论,实际上是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了复杂“共演”模式上的一个环节,未能看到在当代“液态”社会下不同力量彼此作用的复杂过程。

### [参考文献]

- 埃文思-普里查德,2002. 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褚建芳, 阎书昌, 赵旭东,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卞冬磊,2022. 作为存在的媒介时间: 手机与社交媒体的时间性. 新闻与传播研究(11): 56-70
- 卞冬磊, 张稀颖,2006. 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1): 32-44
- 费孝通,2008. 乡土中国.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古尔维奇,2010. 社会时间的频谱. 朱红文, 高宁, 范璐璐,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关琮严,2021. 属性转移、边界消弭与关系重构: 当代乡村媒介空间的转型. 新闻与传播研究(4): 57-72
- 洪源远,2018. 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李翠玲,2017. 都市化村庄的公共生活、“二元时间”与地方节奏——以珠三角宁村为个案的分析. 民俗研究(1): 122-130
- 李蓉,2008. 后工业时代中的媒介与时间.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 119-124

- 马尔库塞,1989.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 牛定炜,王录仓,严翠霞,等,2023.短视频社交媒体使用对山区乡村闲暇生活的时空影响研究——以秦巴山区蒲陈村为例.地理科学进展(7):1285-1297
- 涂尔干,莫斯,2012.原始分类.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加华,2015.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上海古籍出版社
- 文军,陈蕾,2019.资源、制度与情境:现代社会中时间意涵的理论流变.社会学评论(5):3-14
- 西尔弗斯通,2004.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许然美,杨成胜,2008.中国传统乡村时间观念解析.民族论坛(6):28-29
- 亚当,2009.时间与社会理论.金梦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杨善华,1999.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 湛晓白,2013.时间的社会文化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文娟,2022.媒介时间的变迁与主流媒体融合创新.电视研究(5):86-88
- 郑作或,2018.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From Field to Screen: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al Temporal Landscapes

JI Guangxu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media society, modern media, represented by short video platforms such as Douyin, have become deeply embedded in rural daily life, exert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velihoods. Through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Z Village in Jiangxi, it was found that villagers and short video platforms have formed a mutually interactive and intricately interwoven "co-performative" model of commercial produc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mporal landscape in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is inevitable. However, villagers can still rely on their local cultural foundation to rationally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time concepts and traditional temporal inertia while engaging with digital media. Through their daily life practices, they counterbalance commercial influences, collage ecological time with media time, establish new power-demand relationships, and develop unique media practices amid the ripples caused by emerging technological media. In this continuously evolving process, on the one hand, villagers' leisure time is utilized for the commercial production of short video platform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short videos have also become a leisure embellishment embedded within the local agricultural rhythms of the villagers. This non-oppositional and non-binary model of modern rural temporal landscape vividly embodies the collage and nesting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resenting a new form of rural daily life.

**Keywords** Short video platform; Rural; Commercialized time; Media integration